

布罗茨基译唐诗

■ 谷羽

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刻的理解。他也不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翻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晚上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办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更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斯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

■ 顾钧

《广东方言读本》(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是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也是在中国写作完成的第一本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该教材尚无固定的中文译名,日本学者曾使用《广东语模范文章注释》、《广东语句选》等译名,恐怕还是称为《广东方言读本》比较合适。

《读本》的主编者裨治文(E. C. Bridgman)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于1830年初抵达广州。早在1835年,他就有意编写一本汉语教材,后于1837年开始动手,第二年完成。《广东方言读本》于1841年在澳门出版,大8开本,693页,是美国人有史以来最早的汉语教材。

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在同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在裨治文之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因其编写的《华英字典》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817年。19世纪的传教士最早往往是凭借语言学的业绩而得到学界承认的。

裨治文之所以要编写《读本》,是因为想学广东方言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但自1828年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工具书出版,对这一方言的忽视显然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外交流”(《前言》)。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读本》以简易语句的形式提供练习,每页分三列,分别英文、中文及拼音。试举两例:(1) Please sit down; 请坐; Tsing tso; (2) A catkin is the silken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美国

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

在我床前
横着一道月光。
或许,这是霜?——
自己颇费猜详。
我把头仰起——
望着窗中月亮,
我把头垂下——
不禁想念家乡。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吉托维奇却把他的杰作译成了可笑的“现实主义”小诗。诗人仿佛喝醉了酒,要跟什么人争吵似的,眼睛盯着窗户,却不清楚究竟要看什么。随后在床上做起了体操——抬头,低头,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翻译家吉托维奇恪守一条原则,总是把汉语诗的一行译成两行。在阿伊斯特看来,这种方法很笨拙,并不可取。

阿伊斯特对吉托维奇译作的评价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样有些偏激,对他们喜欢的人,赞赏有加,而对不喜欢的人,则攻击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其实,吉

托维奇是个严肃认真的诗歌翻译家,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译诗集,他的译著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得到著名汉学家的肯定,比如费德林对他的译诗就很欣赏。他翻译中国古诗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否定与抹杀的。

话说回来,布罗茨基喜欢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国大学讲课,曾向他的学生推荐李白的诗,建议他们阅读《长干行》。他认为李白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堪称哀歌当中的杰作。

布罗茨基不仅喜欢李白,也很欣赏诗人王维,说来有趣,因为他觉得,王维的名字汉语发音很像英语的 One Way。而 Way 就是“道”,是《道德经》的“道”。王维有一首诗《鹿柴》,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布罗茨基很欣赏这首诗,把它译成了俄语,翻译成汉语如下:

山上无人,不见人影的山。
只听得见山中溪流流淌的声音。
月光穿过树枝茂密的空隙
在紫色苔藓上留下奇妙的花纹。
除了孟浩然、李白、王维的诗

歌,布罗茨基还翻译过杜牧等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大都是唐朝诗人的绝句。从本质上说,他以诗人的眼光与胸怀进行了独特的体验,并用另一种文字给予再现,他的译诗语言富有诗意,具备自己的特色。他的翻译方法较为自由和灵活,但与原文对照,时有出入,可谓有得有失。

除了唐诗,布罗茨基还喜欢老子的《道德经》。他也渴望访问中国,想路上产生了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的土地,可惜他在56岁时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他曾收到中国台湾的约请,可惜未能成行,这大概也是他临终前的一点遗憾。

莫斯科《文学日报》的主编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是俄罗斯新当代作家、评论家,多次来中国访问,喜欢中国文化。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布罗茨基受“道”的影响》。他对布罗茨基的中国情结有详细的描述,使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我这篇短文借用和参考了他提供的最新资料,特向他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愿意把阅读的欣喜、发现的惊奇与爱诗的朋友们一道分享,正是邦达连科的文章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诗人布罗茨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使我明白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何以能写出《明朝书信》那样的作品。

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

flowers of a willow; 柳絮柳之丝也; Lau sui lau chi sz ya. 第一例选自第一篇第二章《习言》,第二例则选自第十四篇第一章《草木百体》。全书共分17篇,分别是:(1)习唐话;(2)身体;(3)亲谊;(4)人品;(5)日用;(6)贸易;(7)工艺;(8)工匠;(9)耕农;(10)六艺;(11)数学;(12)地理志;(13)石论;(14)草木;(15)生物;(16)医学;(17)王制。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帮助读者学习广东口语,也在于帮助他们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虽然名为“字汇”,但最后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句子,《读本》可以说是这一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读本》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也更为丰富和精当。《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外国人学习广东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829年10月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传教会给了他若干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入汉语有害于他们)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精神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传教会的指示中担心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应该就是指此而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变,中美《望厦条约》中约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学各

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裨治文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的主要翻译,其时他已经来华十多年,但据中方人员的看法,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1844年是马礼逊去世十周年,这位最早的汉语教师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计去世前几年能够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就是明证。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可供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少,主要有这几件: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1813)、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1822)、公神甫(Joachim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欧洲人的著作,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只能使用马礼逊的著作了。通过一种外语学习另外一种外语,其困难难以想象。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对欧洲大陆语言并不陌生,但通过英汉对照的教材来学习汉语无疑更为方便。

美国汉学要想赶上欧洲大陆和英国,首先要从汉语的掌握上下

工夫。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英国。截止到1847年,来华新教传教士总共是112人,其中英国35人,而美国是73人。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教材。中文教材和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裨治文编写的《读本》。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传教工作很难开展,裨治文于是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了马礼逊和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 W. C. Olyphant)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印字也在数月后到达。1832年5月,裨治文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第一期面世,此后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出版。印刷所在广州运行了四年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进一步限制而不得不于1836年初移至澳门,直到鸦片战争后才于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后又于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在澳门运行的八年当中,印刷所的任务除了《中国丛报》之外,主要是刊印了包括《读本》在内的几部教材和字典。

印刷教材和字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但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时候,只能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

刷。但自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 J. Napier)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以来,这样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进行。裨治文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澳门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属于东印度公司,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该字典也就成为西人用中文活字刊印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马礼逊还利用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马礼逊去世后,这套活字开始由美国的传教士掌管使用。1842年,英国当局将这套活字正式赠予了美方。

《读本》是澳门印刷所刊印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伦敦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檳榔嶼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该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作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完了三分之一。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相比而言,《读本》的编写和印刷过程要简单得多,因为都是在澳门一地完成的,所以没有经历《福建土话字典》那样的好事多磨。

倪萍画笔下的人生

■ 午后咖啡

不喜欢追星,也没有追星的工夫,忙着养家糊口的人。

对于倪萍,既不像她的粉丝们那么爱她,也不像那些评论人们那么瞧不上她。像平行线,在这个时空里。偶尔看着电视屏幕感叹一下,她沧桑的真快。像我一样。

因为工作的关系,被动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倪萍的新书《倪萍画日子》,却看到我不由得不得赞叹她。

读了多少年中文系的我,写不出这么鲜活的文字来。而她,淡了主持人的光芒,却又亮起了写字的笔,更在近五十的年龄上,挥笔画进了荣宝斋的大堂。

她写小时候去姥姥家,下车后走的那三里路是她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三里路。

“最后的十里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了茄子、辣

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嗓子

里堵满的都是咸咸的泪水。三米的菜地

很不能走上三分钟,绊倒了茄子,撞掉了

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部没

得舍得,都等着我这个出外的城里人回来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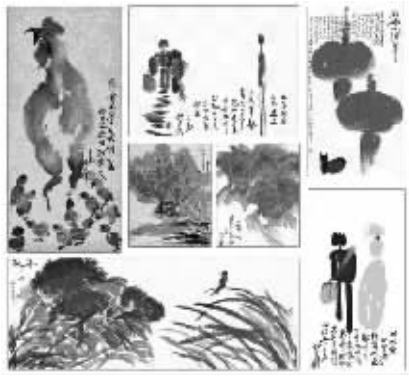
哪,它们的老祖宗就出来了。”

她把一揽子牵牛花都写到我们身上了,亮艳艳的扑了我们满眼。小时候,我经常看着着露水的牵牛花发呆,为那种

朦胧的蓝,朦胧的粉,晶莹的白,感动。我可从没有写过。我是所谓靠文字吃饭的啊。即使写,我也写不出她这样的境界,不觉得吗,这一片牵牛花就是她,就是这个看上去有点憔悴,但却是最有韧劲儿最有生命力的女人。

她擅长写故事,把场景写的让你感觉亲在眼前。她有这本事:“那时候,我整天拿着树枝在地上画,有一回把姥姥的大辫子从门口一直画到院子里,辫子长得像一条大河。姥姥一天里进出无数趟,每回都

贴着小脚绕着‘河’走,‘可别湿了俺的鞋!’鸡鸣从‘辫子’上走过,姥姥都把它们



倪萍的部分画作

的时候跳过来,阳光撒满了院子,孩子脸上的笑比阳光更灿烂。

她的胶东方言给予了她和东北方言不一样的幽默,温柔又犀利,笑和泪和在一起:“达人秀总导演金磊半夜打来电话:‘倪姐,有一特好的想法!今年春节特别节目,把你们家九十九岁的姥姥请出来,你和她一块儿上,绝对牛!’我说:‘好哇,准备铁锹,拿个麻袋,把姥姥从坟墓里挖出来。’”“姥姥二〇〇八年就去世了。”

倪萍,你可以读一读,她的画,她的字,她的人生。《倪萍画日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29.00元

《黄河文学》2013年第1期(总第159期)目录

话题·文学的干净	挂在心幕上的电影	柳萌
作家首先不应该自娱自乐		赵冬妮
彭晓明和歌	我爸爸	王佐红
新青年阅览室	散文三题	一种跌宕的瞬间
消失的村庄	苏宁	高维生
小说		杨广军
在光亮的房间点燃蜡烛	转悠	新加坡日记(2010、2012)
王海雪		
红烧耳朵	庄青	吴俊
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黄河论坛	
单脚站立	徐永	董萍
单车	邹亦	光头演绎的不仅是青春
成难		闫宏伟
鲁院日志		黄河诗岸·宁夏的诗(上)
叶子 曾秀华 杨莹莹		
沈诗祺 朱未等		杨梓 陈晓燕
散文		李文田 鑫
角色	李存刚	刘岳 倪万军 林一木

投稿邮箱:
hhwxsw@163.com(小说) hhwxsw@163.com(散文)
hhwxsg@163.com(诗歌、评论)
电话:0951-6888593 6888599
发行联系:苏先生 电话:5129909
地址:750011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8号银川市文化艺术中心东楼